

总 序：畅游中国历史的长河

历史学术走到了今天，突然面临着巨大的冲击。

这个冲击来自两方面：一是商品化趋势的冲击，一是学科内部发展的冲击。历史学术能否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创造效益？从一个方面来看，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历史学创造的是精神产品，它必须通过“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心灵，而无法立竿见影地创造利润价值。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答案又是肯定的，因为中国人本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感的民族，对历史一直存在浓厚的兴趣。从唐宋时期说书场上的“或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到今天大量历史题材的影视、小说的流行，甚至各种历史古迹、文物古董全都被卷入了商品化大潮。

来自学科内部发展的冲击也同样猛烈。从哲学上看，历史学术是否能像以往人们确信不疑的那样肯定获得客观的真实？历史学的真理性靠什么来检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已经变得多种多样，起码人们认识到了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大量主体因素是几乎无法避免的，人们只能相对地接近历史的真实，而无法绝对地获得历史认识的真理。意识到这一点，并不等于说让我们干脆放弃对历史真理性的追求，而是让我们的头脑更清醒一些，认识到我们自身的和学科所固有的缺陷。

从内容上看，历史学术如果仍然把自己的目光局限在极狭小的政治史领域、局限在“英雄们的历史”和重大事件的历史上，

而不注意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小人物”的历史，不注意了解“人”而只是面对一个个无生命性格的政治机器或军事机器，那肯定是要“自绝于人民”，或者只能成为“影射史学”或类似的政治工具。一位史学史专家曾经对我说，古代史家讲过“逆取”与“顺守”的道理，就是说打江山的时候要扭转乾坤，与命运搏斗，而守江山的时候则要顺乎民心，顺其自然。从历史上看，“逆取”的时间要比“顺守”的时间短得多，历史学家为什么总是愿意盯着前者不放呢？

从方法上看，为了让广大群众接受历史学家从历史发展过程中提取出来的经验和思想精华，首先就要设法增强他们对历史的兴趣，加强他们的历史感，这本来就是历史学家的职责。我非常钦佩已故的吴晗先生等人，他们编出来的历史小丛书，也许在社会效益上比一本博大精深的学术著作还要大。如果通过这样的努力，使普通读者的历史认识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对于历史学术来说，贡献有多大呵！人们始终在期望着能让读者看懂、而且看得有兴趣的历史学术著作，这应该是史学工作者的努力方向。

我们究竟应该怎样面对这来自两方面的冲击呢？

想到这里，不能不提到几部令我印象颇深的海外历史读物。一部是《光荣与梦想》，称为本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的“美国实录”，作者自由纵横的笔法和译者高超的译笔使我了解了美国的现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百态，尽管读后已有十几年过去，但我依然认为，现在还没有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美国现代史能比它更出色。另一部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它的写法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中国史著作，尽管对书中的某些观点我始终不能苟同，但那种跳跃的思路、活泼的笔调和自由的议论，正是我们的历史

著作所缺乏的。除此之外，关于美国史的《美国人：开拓历程》三部曲、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以及没有翻译过来的、史景迁的《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不同角度上引起人们的兴趣。

于是，这些著作不仅在原出版地，而且在中国，都引起了读者的浓厚兴趣，它们虽然是历史著作，但却有大量非历史专业的读者；它们虽然是百分之百的学术著作，但却一次、两次地再版，成为畅销书或者常销书，从而获得了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效益，这难道不应该对我们有所启示吗？

以上的一些想法，就成为这套图书产生的思想背景。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一套书，就是一些中青年历史学家在更新传统历史撰述面貌方面所做的一点尝试。相对比较“正统”的历史学术著作来说，这套书的写法似乎有点不伦不类，但仔细阅读下去，又发现它们的确就是学术著作：不仅言之有据，置有大量注释，而且作者的议论和分析充溢于全书之中，不乏精彩的思想火花。

酝酿这样一套书，大约是在5年多以前。当时，我与这套书的主要作者之一、《历史研究》编辑部的王和先生商量，能否创作一套雅俗共赏的历史学术著作，而这套书的要求是，每部书都要用一个人物群体作为主要线索，通过这个人物群体的活动，反映出他们所处时代的精神风貌和时代特色。这套书绝不能写成特定人物群体的合传，人物只是穿针引线的引子，最终目的是写历史。但这一历史又不要求面面俱到，要重点突出。同时，要切忌写成呆板的叙述史，而要充分展开议论，即所谓老生常谈之夹叙夹议、史论结合。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跳出第三者冷静评判的圈子，加强主体的投入，如果可能的话，在自己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写出自己的秦史观、唐史观、明史观等等。在写法上，可以学

习同类优秀著作的风格特征，可以大幅度地跳跃，可以采用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总之在革新历史撰述体裁方面做一点尝试。

以上的想法得到了许多有共识者的赞同，可是落实起来实在困难重重。许多作者虽然答应下来，但经过一番尝试，发现这比他们熟悉的传统写法要难得多，这也正是此书问世艰难，拖延了如此长时间的原因之一。此书终于完成之后，也未必每一本都达到了我们预先设想的那个水平，有些差距小一点，有的差距大一点，这也是集体创作过程中较难避免的。但我们毕竟走出了第一步，虽然步履蹒跚，但总比原地踏步的好。在此，我们仅把此书当做引玉的砖石。

这套书的组织编撰，使我再次认识到了寻找作者之难，也使我又一次认识到了历史专业人才培养上的缺陷。按我们的初衷，本书作者应该是既在史学理论方面有一定造诣，又是某一断代史的专门研究者，这样，本书的质量就能得到保障。可一旦着手去做，就发现这样的作者屈指可数，而且这些人既有这样的特点，就必然工作极其繁多，无法保证工作的按时完成。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努力这样去做了。目前的这个作者队伍，仍然是有相当实力的一支学术力量，没有他们的合作，本书的完成是无法想像的。他们日常的工作都极其繁忙，或是担任部门的领导工作，或是承担着许多国家的研究项目，或是忙于自己的研究计划，或是身体多病，家庭负担繁重，但为了共同的目标，他们都先后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使我由衷地感动。中国青年出版社不仅排除干扰，承担了此书的出版工作，还将其列为他们的重点图书，也使我满怀谢意。

古人讲，一部好的历史书，要“精意深旨”，“笔势综放”，要“于序事中寓论断”，而且“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要“闲中肆

外”，“居今察古”。尽管不知道通过我们的如此这般的努力，能否对付得了前面所讲到的来自两个方面的冲击，但我仍希望我们能不负古人的期望。

是为序。

赵世瑜

1996年3月

目 录

- 卷 首 孔子以后的世界 (1)
 从魏国初年的君臣际遇谈起·3/“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10/黄金台的故事·18/
 一代精英·25/
- 第一章 不仅是机遇——成功的卫鞅 (31)
 黄土地上的渴望·33/择木而栖的良鸟·
 40/赢得了朝廷辩论的胜利·47/从立木示
 信到割去太子师傅的鼻子·50/评说不尽的
 是非·57/
- 第二章 大丈夫孟子 (67)
 一介醇儒·69/“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76/三宿出昼,犹以为速·82/“大丈夫”气质
 ·88/人皆可以为尧舜·94/
- 第三章 以自苦为极的墨者 (103)
 特殊的士人团·106/“夏道”与“周道”
 ·113/战胜了公输般·119/设计理想国
 ·125/从“显学”到绝学·130/
- 第四章 一怒而天下惧的策士 (139)
 佩六国相印的“东周鄙人”·142/张仪
 问“吾舌尚在否”·146/犀首公孙衍·

- 151/以百诞而成一诚·156/从厕所中救出的濒死者·162/
- 第五章 不治而议论的学士 …………… (173)
- 学术荟萃的稷下·175/滑稽多智淳于髡·183/形形色色的黄老之术·188/“谈天衍”·195/三为祭酒的荀子·199/
- 第六章 设计战争却不会设计自己——兵家的悲剧 …………… (211)
- 孙武的后代·213/从乐羊到乐毅·220/关西出将·226/李牧之死·233/
- 第七章 无待的隐士——庄周 …………… (243)
- 许由、务光的遗绪·245/宁做曳尾途中的乌龟·253/关于浑沌的故事·260/鼓盆而歌与梦为蝴蝶·264/
- 第八章 士之末流——刺客、食客、鸡鸣狗盗之徒 …………… (271)
- 并非高尚——刺客的追求·274/脱颖而出的食客·281/鸡鸣狗盗及无赖奸人·288/被豢养的学士·293/
- 结 卷 被当作了蠢虫——诸子世界的终结 … (301)

卷首：孔子以后的世界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两周之际的社会变革，造就了一代知识者群体——士阶层，并且造就了前所未有的尊贤任能的社会环境。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代知识分子的战国士人并没有辜负时代对他们的厚爱，他们充分利用了时代提供给他们的机会，在短短 200 多年的战国舞台上，演出了许多有声有色的活剧，显示了自身的价值，更推动了社会历史的进步。

从魏国初年的君臣际遇谈起

公元前 446 年，历史刚进入战国，地处七国中心位置的魏国便发生了一件开战国风气之先的新鲜事：刚刚即位不久的魏文侯在总揽万机之中，竟然寻得一位布衣出身的儒者子夏为师，并颇为专心地跟他学起经艺来。

这位子夏先生姓卜，本是卫国人，年轻的时候曾就学于孔子，是孔子当年的得意门生之一，被列为孔门下面文献学科的佼佼者。孔子去世后，他回到老家西河（约今河南浚县和滑县一带的古黄河沿岸地区）教授，日子过得虽然清苦，却继续培养出像段干木、李悝^①这样的名士来。由是，他的名声传进了文侯的耳朵里。当文侯在西河访得他的时候，他大约已是六七十岁的一介老儒了。

那时的魏国甫由晋国分出，文侯年轻而富有朝气。他拜子夏这样的人为师，大概并不仅仅是为了学得一点儿知识，更不是要给自己沽名钓誉。从后来发生的事情分析，他的主要目的，是要借此机会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中寻找些辅佐的人才。不久，他就打听到了段干木的住处，并前往拜访。可是段干木竟越过垣墙逃走，不愿见他。为了表示诚意，文侯每次坐车经过段干木家门口的时候，都特意从车中起立，扶着车轼表示尊敬。终于，段干木为文侯礼贤下士之举所感动，他和

另外一位名士，也是孔门高足之一的子贡的学生田子方一起，成了魏文侯的朋友。据说田子方也是一位高尚其身的人物，他坐在魏文侯身旁，连太子来了也不愿起立示意，但文侯仍然礼之若素，这使得子方不得不倾心服事于魏。不久，田子方又引来自己的学生翟璜^②，翟璜又引来吴起、乐羊、西门豹、李悝、屈侯鲋、翟角等一大批人物。这些人在魏国出将入相，不只是分别担任角色，而且各自建功立业：或如李悝那样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使魏国臻于富强；或如西门豹在邺兴修水利，引漳河水造福一方人民；或如吴起为魏西河（今陕西境内华阴以北、黄龙以南的黄河以西地区）守，使秦兵不敢东向；或如乐羊为魏北伐，拔取中山……由于他们的活动，一时间，竟使魏国在战国七雄中脱颖而出，一跃而成为战国初年独霸中原的霸主。

这出由魏国君臣际遇演出的战国历史上的第一幕，自然给人们留下许多启示，但是首先引起我们思考的，却是造成这种风云际会的时代和社会环境。

仔细考察一下魏文侯手下这些智能之士的出身，可以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出自孔



子夏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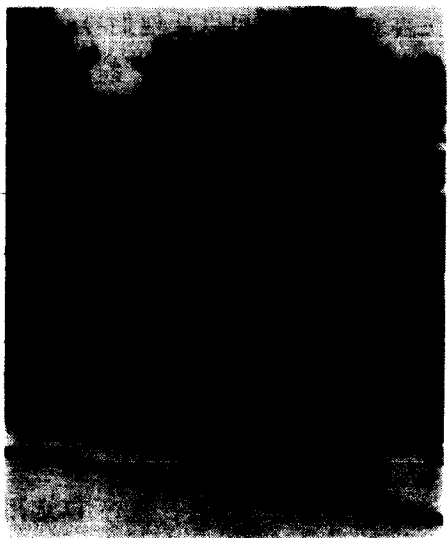
门：或为孔子弟子，或为孔子再传弟子甚至三传弟子。除上面提到的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翟璜以外，李悝亦为子夏弟子，吴起则是曾参弟子^③。他们作为孔门七十二子之后，论学问、道德乃至其他方面的才能，不见得都强过孔子，孟

子就曾说过“宰我、子贡善为说辞，而孔子兼之”，可是他们却一个个比他们的老师在社会上混得有出息。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可以说是“王者师”，翟璜、李悝先后担任了魏国的卿相，吴起在魏虽只任为郡守，可是以后到了楚国，仍然做到了令尹（楚国的最高长官）。而孔子在鲁国最高只做到司寇（司法官），并只做了不到三年光景就被迫去职。之后带着学生周游列国，也同样不被见用。这样一种反差，就连当时的人们也不免发生感触，如《吕氏春秋》的作者就曾为孔子抱不平：

孔子周游海内，再干世主，如齐至卫，所见八十
余君，委质为弟子者三千人，达徒七十人。七十人
者，万乘之主得一人用，可为师，不为无人。以此游，
仅至于鲁司寇。^④

他说孔子有那么多能干的学生，每一个都足可以做王者
之师，而他自己辛苦
游历的结果，才当上
一个小小鲁国的司
寇。作者将此现象归
结为“遇合”，即个人
偶然的机遇。他说得
比较含糊。东汉王充
对此问题的理解就
更深刻一些，他说：

操行有常
贤，仕宦无常
遇。贤不贤，才
也；遇不遇，时



孔子入周问礼处

也⑤。

说到机遇的遭逢是由“时”，即天时决定的。不过他对“时”的具体解释却不那么令人满意，谈到孔子和孟轲的不遇，他认为是由于孔、孟碰到的君主“才下知浅，不能用大才”的缘故。而像战国商鞅那样的游说之士之所以见遇，则是因为他们所持的议论投合了时君的胃口：“故说者不在善，在所说者善之；才不待贤，在所事者贤之。”这种解释虽有一定道理，但仍将事情归结为具体的人事，看来也是不足取的。

实际上，在战国初期，对于包括孔门弟子在内的所有知识者阶层来说，他们都面临着与魏国那几个走运的知识分子同样的机遇。也就是说，不仅是在一个魏国为人才提供了用武之地的好机会。比魏文侯稍晚，邻近的赵国也传出了一个令人动容的任贤故事：赵烈侯喜好音乐，问相国公仲连道：“我喜欢两个人，可以让他们尊贵吗？”公仲连说：“让他们富起来可以，尊贵之则不可。”烈侯说：“那好，我喜欢的歌唱家

枪、石二人，请赐给他们各万亩良田。”公仲连当面答应下来，暗中却拖着不办。烈侯催了好几次，公仲连都用托词敷衍过去。但在私下里，公仲连却访到了三位真正的贤士牛畜、荀欣和徐越。他让他们依次去觐见烈侯。结果牛畜说烈侯以仁义和王道，荀欣说烈侯以选用贤能，徐越则以节财俭用进说烈侯。这些都送到了点



子思像

子上,使烈侯感到要言妙道确实比歌唱者的声音悦耳,因此他主动中止了给歌者赏田的决定,同时拜牛畜为师,荀欣为中尉,徐越为内史,也赐给相国两领衣裳以示表彰^⑥。



在过去孔子曾遭冷遇的鲁国,也一

相传孔子出生处夫子洞

改往日的态度,对孔子的孙子子思格外地尊崇起来。鲁穆公为使子思能留在鲁国,不断地派人问候子思,又不断地给他送去鼎肉(装在鼎里面的肉食),结果反而惹得子思不高兴。他最后干脆将来人拒之门外,说穆公这样给我送吃的,无异是拿我当犬马一样地喂养。后来穆公自己前往求见子思,告诉他说,自己要像过去的千乘之君那样和士交朋友。没想到这更引起子思的不高兴,说你要是真拿我当贤人,就应当讲如何侍奉我,怎么可以与我以朋友相称呢^⑦? 这位穆公礼贤下士做到了家,竟使得子思有点自高自大起来。据说鲁穆公也召得一批贤人,如曾参的儿子曾西、子张的儿子申详,及公仪休、泄柳等,甚至吴起仕魏前也一度在鲁待过。惜乎战国时的鲁国已地小国弱,不能像魏国那样有大的作为。

还可以讲出一些这方面的故事,它们说明,刚刚进入战国的整个中国社会,已形成一个尊贤任能的大环境,只是这个大环境的出现,才导致了战国众多士人的风云际会。孔子

之不遇，就是因为他没赶上这个社会环境，虽然他作为春秋时期的最后一班士人，距离这个时代也就只有数十年的光景。

春秋战国之际，是我国历史上的一大变革之期。这个时期不仅发生了有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楚白公胜之乱等一系列震动社会的重大事件，在政治制度及经济文化领域也出现了许多令人瞩目的变化。昔日顾炎武作《日知录》，就已敏感到春秋与战国作为两个不同时代的许多巨大差异，他说：

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言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⑧。

顾氏所论虽只涉及到春秋及战国社会风俗的某些现象，但亦显示出这两个时代之间确实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革。其中与我们这本书的主题有较大关系者，一是他指出了七国时代“士无定主”，即广大士人游说四方，为建功立业，各择明主而栖之的现象；二是他发现七国时代已再无有“论宗姓氏族”，即讲究贵族出身，以血缘亲疏论身份高低的现象了。这后一种现象，正是造成前一种现象的首要原因。

老实说，孔子在鲁国之所以不得任用，固然有他的学说过于理想主义而不太切合实用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在于他不属于鲁国贵族圈子里的人物。不然，为何日后子思仍操持其祖旧业，却受到鲁穆公那样的器重呢？我们的孔圣人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位好学之士，一次，他打听到鲁国执政大夫季武子举行招待士的宴会，便兴冲冲地前往参加。没

想到还未进得季氏家门，便被季氏管家阳虎喝住：“季氏宴请的是士，不是请你！”^⑨那时所谓“士”，还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读书人”这个概念，而是指下级贵族。孔子的祖先虽说是逃到鲁国来的宋国公族的后代，父亲叔梁纥又曾当过一段时间的陬邑宰，但由于他是其母颜氏与叔梁纥“野合”的私生子，打一生下来就未曾被孔家承认过，而由颜氏带着他在贫民区长大的，故而在传统的鲁国贵族的名单上没有年轻的孔子的名字，这使他连贵族家的大门都进不去！后来孔子发愤努力，又教授出一些学生，人们逐渐知道了他的身世，开始对他有些另眼相看了。即令如此，他也仍然进不到传统的鲁国贵族的圈子里去。当他好不容易当上鲁国的司寇时，一帮贵族竟然讽刺道：“这岂不是鹿皮袍子配蔽膝吗！”^⑩那时鹿皮袍子为普通人常服，蔽膝（一种绘有文彩的皮制围裙）则是贵族礼服的一部分，二者自不般配。贵族以此讽喻孔子不该为司寇，因为他还不是贵族。

西周以来的规矩，周王室及诸侯国内执掌政权的卿士，例由贵族世袭担任，是即所谓“世卿”制。任为“世卿”的贵族又世代享有封土以为俸禄，是即所谓“世禄”制。西周初年，周公旦与召公奭共同辅政，号称“二公”。到了西周末年，宣王继位，扶他上台的仍是周公和召公，他们二位便分别是周公旦及召公奭的后代。到了春秋，见于史乘的周公后代有周公黑肩、周公忌父、周公阅、周公楚等人；召公后代则有召武公、召昭公、召桓公、召庄公、召简公诸位，他们都长期世袭担任着王朝卿士。在孔子父母之国的鲁国，自春秋初年起，便有“三桓”，即鲁桓公的三个儿子的后代世袭执掌鲁政。在孔子周游的列国中，齐有国、高二氏，宋有六卿，郑有“七穆”，卫有孙

氏、宁氏，皆为世掌各国政权的大族。在这样一种环境中，设想有哪一家贵族会把卿的位置让给普通人出身的孔子，岂非咄咄怪事！尽管孔子发出了“举贤才”的呼喊^⑩，可是在那个时代，这种呼喊的影响实在是太微弱了。

孔子大概也看清了这种形势，就像后来许多在仕途上碰到不如意的士人那样，他开始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教授学生上。他希望把政治理想和才能传授给学生，使他们在将来去实现自己未了的愿望。好在那时虽然政治上的贵族专政未见松动，旧的教育制度却已出现了转机。由于国君在与贵族的争权夺势中处于劣势，一直由官府操办的学校也难以维持下去了，民间开始出现了私人办学的现象，这给了孔子设帐授徒的机会。当然孔子没有想到，他在事业上的这一转变，竟奠定了他在历史上作为真正伟人的地位，也为他以后非常生动的战国时代奠定了广泛的人才基础。

“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

孔子是战国士人的先驱，也是他们的培育者。

公元前 479 年，一代宗师孔子在他的故乡鲁国曲阜逝去。因为孔子生前已有些名声，前来参加丧礼的人倒有不少。甚至鲁哀公也赶来吊唁，还在丧仪上朗读了他的谏文（悼辞）。但这里面真正对孔子抱有无比痛惜之情的，则莫过于长期在他身边受到他朝夕教诲的学生。当孔子下葬以后，他们都自动地穿起了粗麻布做的丧服，为孔子守丧三年。这种为周礼所规定的最重的服制，一般只是孝子们为亲生父母才服